



浙东作家文丛（第二辑）

杂读偶记

◎ 黄百竹 著

宁波出版社

 浙东作家文丛(第7辑)

杂读偶记

黄百竹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读偶记/黄百竹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8

(浙东作家文丛. 第7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414-6

I.杂… II.黄… III.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1698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7辑)·杂读偶记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黄百竹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028千(本册字数225千)

印 张 161.5(本册印张18.75)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414-6

定 价 240.00元(全十一册)

目 录

二〇〇九年

- 003 / 重要的是真相
- 005 / 运动记愧
- 008 / 还是陋习
- 010 / 又来了,繁体字
- 012 / “是真佛只说家常话”
- 014 / “人归人,文归文”
- 016 / 李辉果然出手了
- 018 / 劣译史景迁
- 020 / 写作文言文?
- 022 / 我看“季四点”
- 024 / “文学”得不是地方
- 026 / 润色之功
- 028 / 文化老人又弱一个

二〇〇八年

- 033 / 佳人作贼
- 035 / 几句多余的话
- 037 / 内部书

039 / 《参考消息》并未消亡
041 / 谭其骧说儒学
043 / 论“古”之误
046 / 奥氏演说的文言译本
048 / 为季老惜
050 / 吴世昌教词
052 / 代有“模式”
054 / 《听杨绛谈往事》是一部传记吗？
056 / 阎崇年的三个条件
058 / 余秋雨是“作文大师”？
060 / 亦敬亦畏说黄裳
063 / 还是胡适正确
065 / 孙犁晚年的一件不快事
068 / 金岳霖的回忆录
071 / 如此“震撼”
073 / 不止“补白大王”
075 / 去听听老梁的“体育评书”吧
077 / 口述自传的上品
079 / “就我而论，只能如此”
081 / “批评是言之成理的偏见”
083 / 邵诗与王词
085 / “《走向世界丛书》重印了”
087 / 冯至状告《译林》
089 / “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
091 / “我有寸铁，便可杀人”
094 / 有感于两首小诗
096 / 吴经熊笔下的宁波人
099 / 张中行的一本“冷书”

- 101 / 语与文分开说
103 / 同门师兄批评钱文忠
105 / 书香门第
107 / “配书”趣事
109 / 不妨姑妄听之
111 / 样板戏进课堂
113 / 随说浩然
115 / 看那一节《无轨列车》
117 / 翻译不如注释
119 / 陈独秀的私德
122 / 胡适对《雷雨》的批评

二〇〇七年

- 127 / 朱正的“挑剔”
129 / “史家纪实而已”
131 / 一本杂志和一本书
134 / “不必为自己的品位辩护的权利”
136 / 歌词小议
138 / 金庸的思想
141 / 待他们不薄
143 / 朱记《玄奘西游记》
146 / 理想的藏书数
148 / 所谓“名言”
150 / “难咎其责”之类
152 / 史家杨奎松说——
154 / 高明吕叔湘

157 / “垃圾马车”
159 / 郑孝胥卖字与舒同赠字体
161 / 所谓“趣味史学”
163 / 老成凋零又一翁
165 / 程十发·连环画
167 / 奇文共欣赏
170 / 还是“野狐禅”好
172 / “南怀瑾是传道者”
174 / 《读书》的前途
176 / 极端的表达
178 / “萝卜快了不洗泥”
180 / 权威的独断
182 / 那个形态中,她最好
184 / 译 名
186 / 读书读网之议
188 / 王世襄的爱好
190 / 《三字经》作者之争
192 / 何不读更可靠的书?
194 / 文字门槛
196 / 学者本色是诗人
198 / “治政之要,在于安置细民”
200 / 钱钟书的传记
202 / 报章文字说短长
204 / 改与不改是一个问题
207 / 章克标老人
209 / 识繁写简就可以了

二〇〇六年

- 213 / 歌颂型相声
- 215 / “文史差错”怎么成了谣言？
- 217 / 演员的字
- 219 / 《杨钟健回忆录》
- 221 / 宪政与武夫当国
- 224 / 少读鲁迅
- 226 / 苏雪林骂鲁公案
- 229 / “译写”之疑
- 231 / 诗人林庚
- 233 / 人尽可诗
- 235 / “三国热”引出的一块“玉”
- 237 / 约定俗成
- 239 / 话说易中天
- 241 / 文与论
- 243 / 何物“思想界”？
- 245 / 我看“国学大师”评选
- 247 / 学人与文人
- 249 / 杨树达的书生意气
- 251 / 风 范
- 253 / 张中行强调不说假话
- 255 / 张中行先生
- 257 / 字如其人乎
- 259 / “老上海书”

二〇〇五年

- 263 / “书糊涂”
- 265 / 《读书》的问题
- 267 / 都是红楼梦里人
- 269 / 不太正经的说“红”
- 271 / 名人隐私
- 273 / 还是“不知道”好
- 275 / 读书读皮
- 277 / 李瑞环语粹
- 279 / 名人日记
- 281 / “志气不大”的钱瑗
- 283 / 冯友兰的文章
- 285 / 大师之谓
- 287 / 常识至上

- 289 / 后记

二〇〇九年

重要的是真相

章诒和近期接连发在《南方周末》上的两篇长文,前一篇关于黄苗子告密的只是转述、分析别人公布的档案材料,不过由她点出了黄苗子的名;后一篇说冯亦代在章家“卧底”,算是她的早岁亲历,但她之知道“卧底”实情,是在看了冯亦代的《悔余日录》之后,冯亦代可谓自我揭发在先——《悔余日录》早已出版,但一般读者看不到这层,经章诒和一对证,方知事有不堪,也明白了冯亦代之悔到底是什么。

李辉近日在广州主讲“岭南大讲坛”,说到了这两件事,因黄、冯两老是他的传主兼忘年好友,《悔余日录》还是他整理出版的,这个话题他自然回避不了。据报载,李辉表明的基本态度是:“历史档案的公布要全面完整,才能对真相作出准确判断;同时要把真相放到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考察,才不会得出简单化结论。”前一句似是指寓真公布的聂绀弩档案不全面不完整,对章诒和据此点出黄苗子之名有所保留。后一句则是通过说理为冯亦代也为黄苗子辩解。李辉指的“大的历史背景”是:“知识分子的互相检举揭发至少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出现了,到了胡风反革命事件之后、1957年反右之后更是成了必须完成的过程。所以在“文革”爆发前,大量被推入逆境的知识分子和文人,都已经进入了不断检举揭发的政治环境之中。”李辉

还说,“如果我们完整地看这些档案、看这段历史,就会对人与人之间这种深刻的恐惧有深刻的理解,再产生深刻的同情”。

李辉所言,听来颇占高度也颇显公允,但就个案而言,却有点大而无当,近乎空谈——他说的“大的历史背景”尽人皆知,黄、冯两老当然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才有此扭曲之举,这并无疑义;而档案何时才能完整地看到?历史何时才算完整地显现?离开个案的逐一揭示,哪来完整的历史?“深刻的理解”与“深刻的同情”只能产生在真相大白之后,揭示真相本当为了和解,但先要容人谈出并弄清真相。文怀沙说那个年代的事说不清楚,但不说更不清楚,说比不说总要清楚得多。相比之下,李辉就黄苗子事提示的,“全面公布掌握的所有档案材料,才能综合笔迹、签名、时间顺序等因素来作分析,才可以下结论说黄苗子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到底是什么原因”,更加切实合理一点,因为属于事实层面的求证质疑,可以避免因主观臆断而造成冤案。

读章诒和的文章,不难感觉到她的怨愤盖过宽恕,一望而知是受害者的反应,而李辉作为传记作家,给我的印象是往往对传主取仰视角度,过于用情而不免有失客观无讳的天职。两者都表现了自己固执的个人立场。对读者来说,其实重要的唯有真相,理解、同情或可呼吁,但毕竟要凭各人自己选择,是无法强求的。

2009.04.14

运动记愧

昨天的《南方周末》副刊有章诒和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主要转述了《中国作家》今年2月纪实版刊出的长篇报告(这总不能后缀“文学”两字了吧?)《聂绀弩刑事档案》的有关内容。那篇报告的作者寓真据说是“山西资深政法工作者”。聂绀弩“文革”期间坐牢就是在山西，与章诒和还是狱友呢。

令章诒和感到“难以置信”，惊叹“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的是，当年(1962—1967年)是黄苗子等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对聂绀弩进行监视、告密，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黄苗子与聂绀弩一同在1957年落难，去北大荒劳动，60年代初相继返京。物以类聚，当时两人是交往频密的好友，我从别处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其时，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头来形容他是：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聂绀弩去世后，记得黄苗子还写过怀念文章，所以印象中，两人是相知甚深的难友、诗友，是道义之交。

但想不到黄苗子背地里做了那样的事。据说告密材料汇报上去后，执掌公安的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

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真是杀气腾腾!

据章文转述,当时的告密材料除了“尽最大真实地记录”聂绀弩的日常言论之外,还有黄苗子对聂绀弩诗作的“破译”,被用以敲定其文字罪证。从章文摘录的几段来看,黄苗子确是“识者”,如聂作《轱辘体之一》:“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黄苗子的诠释是,“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中。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章文还提到,除了黄苗子等人的告密,曾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的吴祖光、陈迥冬、钟敬文等人,“文革”期间“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

黄苗子、吴祖光都是所谓的“二流堂”人物,本身是历次政治风雨中的“老运动员”,所以在新时期颇著清誉,为李辉这样的后辈文人所敬重。在李辉揭发文怀沙历史的文章中得知,他们对文怀沙都很不屑。但现在看来,文怀沙说的“那个年代的事说不清楚”,倒也是一句实话。不知道李辉看到《聂绀弩刑事档案》会是什么反应?

文人之间的告密,无疑有个人道德、意志的原因,但在那个年代,告密恐怕也属于一种社会常态,文化名人未能例外而已。

今天闻之,说“意外”、“恐怖”,都是事过境迁之后的感觉。章诒和文中提到,“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她没有点名,一旦说出来,估计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就是夏衍所言,“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钱钟书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所作序言中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在过去几十年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中,没有做过一点愧心事的人又有多少呢?钱钟书说,“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智者对普遍的人性弱点的谅解,尽管不无嘲讽。但从历史角度说,真相终究难以永远掩埋,不管当事人有无愧意,总有一天会有人要客观地“记”出来,这是历史的公道处。

黄苗子先生是1913年生人,今年实足96岁了,与文怀沙自称的年龄差不多,他们过去做过的亏心和丢脸的事被如此张扬,真叫“寿则多辱”。说真话有时是残酷的,但不说真话,为长者讳,那就只能继续瞒和骗,大的得失如何是非常清楚的。黄苗子也好,文怀沙也罢,固然咎由自取,我们倒不妨看作是其人对过去那段历史作出的一点被动的担当吧。

2009.03.20

还是陋习

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对记者的一席谈。据报道，在谈到国人出国在外的“陋习”时，武大伟说：“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至于中国游客到美国华尔街喜欢“骑铜牛”，武大伟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他认为，“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

这几年国力渐强，中国外交家的腰板也越来越硬，在媒体上说话越来越放松，因为放松就有趣了，武大伟的话就说得很有趣。另见香港《明报》称，今年的全国“两会”有一个“白话运动”，指的是官员说大白话之风，武大伟说话亦庄亦谐，也可为此一评论添个实例。

武大伟说的不止非官话，而且颇有点别出机杼，听起来很爽，但细究就不免有点可议。大声说话问题，有个群己界限存焉，私人场合说话大不大声谁都管不着，公共场合大声说话，若近于喧哗，势必干扰到别人，似乎就不是一个好习惯。不但在国